

關於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的辯證 問題

The Debate for China's Grand Strategy: A Critical View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起自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不僅徹底影響了戰略的內涵，同時也讓所謂大戰略逐漸形成一個新的討論範疇。儘管如此，針對大戰略的討論至少應先釐清相干概念的定義、範圍與內涵等等問題；特別由於自 1990 年代末起，有關中國「大戰略」的討論也逐漸在海內外引起相當程度的迴響，在本文中我們便試圖就最近十年來學界的討論過程，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著手，設法去觀察並瞭解相關議題的未來發展。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ince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has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immanence of strategy, but offered a new realm for discussing the so-called grand strategy, including its definition, range, and cont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1990s, there're more and more scholars directing their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trategy. In this paper, I'll observe the relative researches and try to predict its development.

關鍵詞：中國、國家發展、大戰略、全球化、新安全觀

Keywords: 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grand strategy, globalization

壹、大戰略思維的內涵與時代意義

西方的「戰略」(strategy)從詞彙字源來看,其原意是「為將之道」(art of generalship),亦即討論一個軍事領袖應如何正確地進行領導作戰的責任,正如 Antoine Henri Jomini 所言:「戰略是在戰場上巧妙指揮軍隊的藝術。」¹而這也將關於戰略的討論長期限制在軍事範疇當中。儘管如此,由於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末爆發後,逐漸影響並重構了整個國際體系與國家間關係的內涵,從而也迫使處於「政策工具」角色的戰略思維必須隨之變化。

不過,如果要詳細說明近代戰略內涵變遷歷程的話,那麼就必須將轉捩點設定在中世紀末歐洲局勢的變化上。正如 K.J. Holsti 所言:「曾發生在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並且在十五至十九世紀繼續被推廣而遍及整個歐洲大陸的乃是有組織的政治權力與行政制度。……國家在十九世紀之前創造了民族,而在後來的兩個世紀中,則輪到民族主義抬頭,……並創造了國家。」²進一步來說,為擺脫中古時期帝國與教廷力量的控制,國家(state)這種新行為體非但重塑了國際體系內涵,同時也連帶創造了主權(sovcreignty)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觀念,也就是任何國家對內均有制定政策與執行命令之完整與單一的權力,對外則彼此間互不干涉,再者,追求主權的最高目標乃實現所謂國家利益,因而國家亦必須設法具體化這些意識並加以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新的歐洲國際體系強調主權平等,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因此利用各種手段爭取權力(power)乃是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目標,更甚者,權力多寡不但關乎國家的政策強度,彼此權力對比亦將決定國家間的互動關係;一方面,維護對己有利的權力平衡狀態是所有國家應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則由此也建構了近代戰略觀念的基礎。

無論如何,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十八世紀末爆發的工業革命不僅

¹ Antoine Henri de Jomini, *The Art of War* (El Paso: El Paso Notre Press, 2005), p.75.

² See K.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4), Chapter 3.

徹底地影響了歐洲戰略研究的內涵，同時也讓所謂「大戰略」(grand strategy) 逐漸形成一個新的討論範疇。基本說來，針對大戰略的討論應當涉及三個問題，亦即：什麼是大戰略？為什麼需要大戰略？以及，在思考大戰略過程中應該注意到哪些內涵重點？其中，第一個問題的目標在於確認其「定義」，第二個問題牽涉到「目的性」之相關思考，至於最後的則是有關「方法論」部份的辯證。

根據 John M. Collins 的看法，所謂的大戰略是指使用國家所有力量，透過威脅、武力、間接壓力、外交、顛覆及其他可以想像的手段以達到國家安全利益與目的的藝術與科學；他同時將此與傳統的軍事戰略 (military strategy) 做出意義區隔，後者是指憑藉武力來求取勝利的辦法，相對地則大戰略若能成功，應可不戰而屈人之兵。³從戰略到大戰略的思維發展，其實是反映了自從工業革命掀起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後，所帶來的「無休止競爭」(permanent competition) 新狀態；此種環境一方面將國家間推向某種極端動態的互動關係當中，再加上前述主權與利益觀念的發展，最後驅使國家從最廣義面來解釋「生存」問題，亦即一方面「缺乏競爭力便無法生存」，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設法長期且持續地去組織並運用所有可資利用的資源，來維繫此種新定義下的生存挑戰，其結果便是 Erich Ludendorff 在 1935 年提出的「總體戰」(total war) 思維，他認為：「總體戰不單單是軍隊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參戰國每個人的生活與精神。」⁴從某種角度看起來，這或許是當前大戰略討論的第一個踏腳石。接著，在 Edward M. Earle 於 1943 年首先提出「大戰略」這個詞彙後，⁵英國戰略學家 Basil Liddell Hart 更於 1954 年深入地闡釋了相關理論，並將此種最高層次的戰略定義為用來「指導並調節一個國家所有軍事、經濟、政治、外交和精神資源，以達其基本政策所規範的政治目標」。⁶

³ See John M. Collins, *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 Chapter 2.

⁴ Erich Ludendorff 著，戴耀先譯，《總體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頁 5。

⁵ See 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

⁶ B.H.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Plume Press, 1991), pp.334-335.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冷戰前半期為止，對於大戰略的思考固然更真切地反映出充滿競爭假定的新國際狀態，但是在操作上卻依舊相當傳統地將戰略所必須處理的國家生存挑戰，設定為由於競爭所帶來的「戰爭危機」(war crisis)上。相對地，在冷戰後半期所出現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概念則不啻反映出國際狀態的進一步變遷；⁷此種觀念的重點是，由於威脅具有多層次的性質，再加上全球化浪潮為國家間關係帶來更複雜難料的互動結構，因此所謂安全其實應擴散至包含軍事與非軍事層面(例如經濟安全或由此所引伸出的能源安全等)，⁸而且光靠軍力或軍事性思考是無法解決此種新安全困境的。總之，從國家所面臨的有形挑戰(邊界戰爭)到國家必須為應付不斷地無形挑戰(競爭)而進行資源的最大利用，然後再隨著無形挑戰範疇的不斷擴大(綜合性安全甚至非傳統安全觀)，戰略既然作為捍衛國家存在的思維工具(亦即用來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的一套辦法)，當然也必須與時俱進，這也是大戰略所以被稱為「大」的主要背景。

在此，我們必須聲明，戰略內涵與層次的演進固然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必然反射，此種變遷所影響的範圍也是無遠弗屆的。首先，在此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不僅是安全來源的重新設定(從純軍事性到全面涵蓋性)，同時也包括安全保障手段的重新思考(從強調競爭到也重視合作)，其次，正由於此種變遷涵蓋面的既深且廣，因此體系內的「所有國家」都有必要根據自己的條件與需求，來設定為自己量身訂做的一套大戰略。最後，固然所有國家都有制定大戰略的必要性，但如何「正確制定且成功地執行」應有的大戰略，則不僅涉及未來發展前景，甚至也將影響國家所擁有權力的表現，並因此帶來群體「興衰」(rise and fall)的發展結果。

⁷ 根據 Muthiah Alagappa 的說法，這個名詞首先由 1970 年代末日本的大平內閣所提倡，其後則有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支持。Muthiah Alagapp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terpretations in ASEAN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and Policy Studies No.26,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⁸ 請參考雷家驩主編，《國家經濟安全理論與方法》(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陸忠偉主編，《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等，朱寧譯，《新安全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表 1：大戰略思考的出發面基礎

| | |
|------------------|--|
| 主 觀 層 面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家發展歷程中的戰略思想脈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傳統世界觀的設定與發展 2. 設定中長程宏觀戰略的政策習慣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效能問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對建構大戰略的需求程度 2. 將戰略研究轉換成政策評估的能力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家發展現況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政經發展現狀的障礙性 2. 民意支持度 |
| 客 觀 層 面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際權力分配現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權力計算問題 2. 大國間戰略互動與假想敵設定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前國際體系的行為規範與互動特徵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對於結構變遷的價值正當性評估 2. 對於戰爭問題的價值設定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前全球結構的變遷趨勢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全球化浪潮與國際經濟網絡發展及其政治反饋 2. 網路世界與社會分化 3. 多層次區域主義與國際建制對國際關係主體論的影響 |

至於有關大戰略思考的應有內涵，可分成「出發面」與「運作面」（參考表 1 與表 2）兩個層面來探討。首先在出發面基礎部份，大戰略思考必然與正確地反思（主觀層面）及觀察（客觀層面）有關，前者指的是國家應捫心自問是否已具備建構大戰略框架的決策條件，包括創新性的政治文化傳統、充滿活力與思考性的政府部門，以及能配合並支撐戰略政策的社會環境等；至於後者的重點則是再度強調，建構戰略的目標既在於處理國家於國際環境中的調適問題，那麼認清國際環境的內涵與變化性當然是前提要務，更何況從前述大戰略

崛起的歷史背景介紹便可以發現，「不斷地進行質變」不但是工業革命以來世界體系最突出的特徵所在，捉住此種變化脈絡更是成功建構戰的第一步。

表 2：大戰略思考的運作面基礎

| | |
|------|---|
| 意識層面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際戰略思想的比較研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霸權興衰史的經驗教訓 2. 過去與現在大國戰略制定的比較分析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際戰略環境的比較研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際體系的結構與內涵 2. 陸權－海權－空權延遞的歷史意義 3. 戰略思考的單一性與綜合性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制定戰略基礎的比較研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政治體制與國家戰略 2. 科技演進與霸權興衰 |
| 政策層面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智性研究的基礎設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提出研究計畫與建立研究機制 2. 成果累積與政策建議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戰略建議的提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長期計畫的思考與研擬 2. 跨部門協調機制的建立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策評估與回應反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設立高層常態性戰略討論機制 2. 擴大對於相關新國際態勢內涵的研究計畫 |

如果能充分掌握前述主觀與客觀思維，則所謂大戰略才可能進入實際的運作面部份。在此，意識層面的工作主要是將前述對於國際環境的觀察，更具體化為思考國家因應對策的基礎，除做好「鑑往知來」的功夫外，也只有如此才能順利進入政策層面的討論，一方面設法提出具初步可行性的架構方案，然後則透過不斷地反饋與辯論以獲致最佳結果。

貳、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源起及其目的性問題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⁹歸究中國所以逐漸興起一股對於「大戰略」討論的背景，主要可能來自三個因素：首先是以後冷戰時期來臨作為出發點，設法去重新理解並體認新國際體系環境下的「世界格局」；其次是以成功地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作為基礎，對中國本身相對國際地位變化（亦即「中國崛起」未來發展）的觀察與期待；最後，則是對於以美國為主之「中國威脅論」的反彈以及思考如何因應之道的結果。

在第一個背景部份，正如石中所言：「由於蘇聯的崩潰，美國成為世界上無可匹敵的唯一軍事大國，這對人類意味著什麼？究竟是災難的前兆還是福音？我們還不太清楚，但是任何對未來世界格局的研究，都必須建立在這一世界新特徵上。」¹⁰儘管一部份樂觀的美國學者認為，由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體系」時期已然來臨，¹¹而自 George Bush 以降的美國總統也一再倡議要建立所謂的「國際新秩序」(New World Order)，¹²但中國的看法（或主觀期待）則是，目前國際體系實際上應趨近「一超多強」的格局，¹³而中國則可能也應該在其中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例如鄧小平便曾指出：「……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不管它怎麼削弱，甚至有幾個加盟共和國退出去。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¹⁴

⁹ 從已知資料看來，早期冠以「大戰略」名稱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王家福的《國際大戰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與蔡賢偉的《中國大戰略》(海南出版社，1996年)，但由於筆者無法取得前述兩書，因此亦無從得知其討論的實際內容。

¹⁰ 石中，〈未來的衝突〉，《戰略與管理》，1993年10月，頁49。

¹¹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1991), pp.23-33; James Eberle, "A Fork in the Road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5, 1991, p.6.

¹² Don Oberdorfer, "Bush's New World Order Rhetoric: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r a Slogan?" *Washington Post*, May 26, 1991, p.A31.

¹³ 參考俞正梁等，《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317-319。

¹⁴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1990年3月3日對中央負責人談話)，引自《鄧

更重要的是，由於改革開放的結果基本上帶來正面效應，於是所謂「中國崛起」也逐漸成為海內外國際關係學者關注的焦點；正如錢其琛所言：「中國正在世界的東方崛起」，¹⁵閻學通也曾提到：「……冷戰結束後，中國崛起的勢頭愈來愈明顯，國人也感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正不斷提高，於是認為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不錯。」¹⁶總之，不管是為了破解西方圍堵政策而必須採取預防性遏制戰略，還是為了防止各大國支持其內部分離主義或台灣獨立勢力，抑或是為繼續爭取一個有助於推動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國際環境，¹⁷中國對本身作為國際政治中「一極」或世界「五強」之一的期許與肯定，¹⁸透過「大國外交」主軸所進行的高層互訪，建立夥伴關係架構，大幅汰舊更新軍備設施，以及利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發言地位等明顯動作，不僅甚有助於拉高其國際地位，也讓許多觀察家推論中國未來將成為美國「並駕齊驅的競爭者」。¹⁹正因如此，「中國威脅論」(China's Threat)也在1990年代初期成為美國政學界所共同關注的焦點。嚴格來講，此種觀點可說源自George W. Bush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將中國視為某種「戰略競爭者」的結果，至於「中國威脅」這個名詞何時被正式提出儘管眾說紛紜，²⁰但它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政策基點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前述後冷戰環境與中國本身發展所提供的複雜背景下，中國應付挑戰的一套邏輯是：首先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後，逐步確立將推動(具中國特色的)

小平文選：一卷本》(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頁463。

¹⁵ 錢其琛總結1993年外交成果時所言，參見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59。

¹⁶ 閻學通等，《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8。

¹⁷ 李登科，〈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策略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第15期，頁38-39。

¹⁸ 杜攻主編，《轉換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頁7。

¹⁹ see Thomas E. Ricks, "Changing Winds of U.S. Defense Strategy," *Herald International Tribune*, May 27-28, 2000.

²⁰ 例如有人認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在1992年演說中，針對亞洲安全情勢提出所謂的「中國威脅問題」，乃是此說法濫觴，參考文馨〈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29卷15期(1995)，頁67；但也有人認為，日本防衛大學教授井龍秀在1990年所發表的〈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文章乃是始作俑者，參考陳岳，〈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外交評論》，第82期(2005年6月)，頁93；當然，有更多人認為Ross H. Munro在1992年9月於*Policy Review*中所發表的一篇短文〈正在覺醒的龍〉乃是整個大規模論戰的起點。

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提高國家綜合國力的長期方針；²¹其次，認定由於美國不可能鞏固其單邊主義政策，因此世界新格局不僅將朝向權力分散特徵邁進，而此種多極化的結果也將為中國提供有利於改善其國際地位的「機遇期」；²²最後，無論中國將如何利用前述所謂機遇期，但因「中國崛起」的趨向幾乎已然勢不可擋，因此更重要是，中國應如何透過更寬廣的視野，運用當前的國際環境與國力要素來徹底扭轉過去百餘年來的歷史與發展困境，而這也是當前中國「大戰略」討論的主要出發點。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國內對於大戰略的相關討論似乎是上述主客觀環境挑戰下的自然合理反應，但從某個角度看來，由美國 RAND 公司中國專家 Michael D. Swaine 與 Ashley J. Tellis 在 2000 年主動針對「中國大戰略」所作出的一本研究報告書，²³除了帶來一連串評論與介紹動作外，²⁴或許也算是引爆這波大戰略討論熱潮的導火線。²⁵

基本上，Swaine 與 Tellis 所以在此時推出該本論著的緣故，或許反映出當時美國正處於調整對華政策轉捩點的需求所致；進一步來說，儘管在 Clinton 總統時代，所謂「以交往代替圍堵」一度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但在新保守主義浪潮逐漸興起的背景下，慢慢地有更多人主張美國應該肩負起領導者角色，一方面希望捍衛並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國際霸權地位，甚至不排除朝「建構帝國」的目標邁進，²⁶這正是美國後來轉而將中國設定為「戰略競爭者」的思

²¹ 參考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台北：麥格羅希爾文化事業，2005年），第二章。

²² 陳佩堯與夏立平主編，《新世紀機遇期與中國國際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徐堅主編，《國際環境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²³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RAND, 2000) .

²⁴ 例如唐世平，〈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安全大戰略〉，《當代亞太》，2000年第6期，頁61-64；周建明，〈評解讀中國大戰略〉，《國際觀察》，2000年第5期，頁38-42；陳向陽，〈解釋中國的大戰略〉，《國際資料信息》，2001年第2期，頁31-32；何增科，〈中國有一個國際大戰略嗎？〉，《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6期，頁26-29。

²⁵ 在此之前的國內相關論著包括：蔡賢偉，《中國大戰略》（海南出版社，1996年）；張春與時般弘，〈大戰略：理論與實例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7期，頁71-75；郭樹永，〈21世紀前葉中國外交大戰略芻議〉，《太平洋學報》，1999年第2期，頁91-96；葉自成，〈中國實施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頁5-10。

²⁶ See Henry Kissinger,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維出發點。在此情況下，為配合美國戰略內涵的轉變，特別是中美關係的必須修正，在「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前提下，總結歸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對外戰略變化也就成為極必要的舉措。Swaine 等從對中國戰略發展的歷史研究中得出幾個結論：首先是「大國信念」(great power self-image) 儘管長期縈繞在中國領導決策階層的心中，²⁷但長期來看，其大戰略設定與操作基本上仍傾向「內向型」而非「擴張型」；其次，中國對武力的使用具有相當節制的習慣，而且經常基於十分「謹慎且縝密」的計算；最後，當前中國所推動的是種「高度務實且儘量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的大戰略方案，目標是在維持與多數大國良好關係的前提下，提高對國際社會的參與度，儘管如此，隨著綜合國力實際提升，2020-25 年間將是其調整大戰略內涵(亦即由消極轉趨積極主動)的關鍵期。

大體來說，Swaine 與 Tellis 對中國大戰略發展方向的研究，基本上符合實際發展狀況，尤其「大國信念」確實扮演相當重要的心理基礎角色：例如胡鞍鋼曾指出：「……富民強國是千百年來中國仁人志士心中的夢想，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一直是新中國幾代領導人帶領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偉大目標」，²⁸葉自成在《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一書序論中開宗明義闡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需要大戰略」，²⁹而時殷弘也認為：「作為一個應有長期性國際政治抱負的大國，中國需要有某種從長遠來看合理和有利的外交哲學」。³⁰由此，無論欲復興中國固有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或希望中國扮演好其長期擁有的傳統大國地位，基於國內對所謂

2001), and Jim Garrison, *America as Empire: Global Leader or Rogue Power?*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04).

²⁷ Steven W. Mosher 也認為：「身為霸主是中國夢寐以求的國家定位，這發軔於其國家認同，更與其對國運的詮釋息息相關；不願向任何外國強權屈服的心態，植根於中華帝國曾為亞洲支配強權的歷史及華人對自己文化優於別族的堅強信念。」見 Steven W. Mosher 著，李威儀譯，《中國：新霸權》(台北：立緒出版公司，2001年)，頁3。

²⁸ 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

²⁹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主要問題及戰略選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³⁰ 時殷弘，〈風物長宜放眼量：論中國應有的外交哲學和世紀性大戰略〉，《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卷第2期(2001)，頁17。

「中國崛起」態勢的普遍正面共識，除透過諸如「大國外交」等戰術性政策來調整自我地位外，³¹如何透過更廣泛大戰略的理性建構來滿足前述心理設定，便成爲當前中國學界討論大戰略問題的「務實性目的」所在。

參、概念釐清與大戰略的方法論問題

根據前述，當前中國大戰略的討論主要乃爲解決環境需求問題（包括後冷戰時期世界新格局、中國崛起態勢與當前美國對華政策變遷等），然後引領中國朝向既定目標（建立或復興大國地位）邁進的一套思維結果；儘管如此，有幾個思考點仍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

首先是「大戰略」與「大國戰略」間的觀念混淆問題。可以這麼說，「大國信念」雖無可否認且不能避免地成爲當下中國大戰略思考的核心，而中國對於大戰略的實踐亦或許的確會將其帶向大國地位，但過度沉湎於此則恐怕不免會在扭曲「目的性」後進而犯了「方法論」上的錯誤。例如胡鞍鋼曾指出：「大戰略是大國的必需品，也是只有大國才消費得起的奢侈品。」³²江西元也認爲：「中國已積聚了走向世界大國行列的綜合實力，……只要以積極的姿態全面參與國際和地區政治、安全、經濟新秩序的改造和創新，……中國完全能夠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³³但正如本文在第一個段落中對於戰略內涵變遷的分析一般，由於近代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體系全球化浪潮導致國際環境既深且廣地不斷變遷，因此體系內的「所有國家」（亦即無論國力大小）都有必要根據自己的條件，爲鞏固生存利益來爲自己量身訂做一套大戰略。從某個角度來看，將大國戰略等同於大戰略的錯誤設定一方面當然來自大國信念誘使的結果，但考慮到當前中國學界對於大戰略的討論主要還是以西方理論作爲基礎，甚至是以

³¹ 蔡東杰，〈中共大國外交的實踐及其對台灣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5期，頁1-16。

³² 參見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序言。

³³ 江西元，《大國戰略與未來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7。

研究並批判美國的大戰略出發，³⁴以大國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又恰是歐美學界的主流思想，³⁵因此導致這種想法也是很自然的現象。

延續著上述問題的是「大戰略」與「外交戰略」間的觀念混淆，而這也是西方國際觀影響下的結果。例如 Zbigniew Brzezinski 便基於地緣政治觀察，從「大棋盤」(grand chessboard) 角度來理解並預測國際關係，並將大國視為彼此競爭的主要棋手：「.....類似橢圓形的歐亞大棋盤上並非只有兩個棋手，而是有好幾位，且各自具備不同的勢力；.....在歐亞大陸西緣一小塊地區，美國的兵力直接部署其上，遠東大陸則是一個愈來愈強大且不聽拘束的棋手，控制著極為龐大的人口.....」。³⁶至於大國間爾虞我詐與合縱連橫的結果，不僅將決定其彼此間實際關係，同時也隨時影響著世界格局內涵的變化。由此則任何大國若想爭取更有利於己的國際處境，首先當然必須對國際形勢有所瞭解，至於「正確認識國際形勢則是選擇正確外交戰略的基礎」。³⁷以此為出發點，中國「總體外交戰略的制定應站在國際大戰略的高度，.....確定中國外交的宗旨、目標，對力量手段的綜合運用以及相應的政策策略原則」；³⁸或者這麼說，「國家大戰略理論應當且可以成為構思、論證和表述中國遠期和近期對外戰略的基本框架和有力工具」。³⁹無論如何，儘管在此並不否認瞭解世界格局與各主要大國的對外戰略，並由此設定自己應如何靈活對應這些情勢確實相當重

³⁴ 參考周玉鴻，〈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大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6期，頁46-49；門洪華，〈冷戰後美國大戰略的爭鳴及其啟示意義〉，《太平洋學報》，2003年第2期，頁18-26；胡鞍鋼與門洪華編，《解讀美國大戰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³⁵ 西方的大戰略個案研究幾乎都以大國為目標，參考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兩書皆有中譯本。

³⁶ See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Chapter 2.

³⁷ 倪建民與陳子舜，《中國國際戰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98。

³⁸ 李而炳主編，《21世紀前期中國對外戰略的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頁2。

³⁹ 時殷弘，〈國家大戰略理論與中國的大戰略實踐〉，《現代國際關係》，2004年第3期，頁40。

要，⁴⁰不過，將大戰略思維的視野窄化到外交政策的選項上，終究並非是一種很恰當合宜的做法。

事實上，根據當前世界新格局的真正內涵看來，所謂大戰略不僅應包括傳統具對外性質的軍事戰略與外交戰略，同時得涵蓋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的發展考量，甚至後者有時候還更為重要，例如 Richard Rosecrance 與 Arthur Stein 便指出，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政治中第三意象（third image，亦即國際體系層次）的強調，他們更希望突出第二意象（second image，即國內層次）的地位，因為一個國家國內體制的特定性質經常決定了其關鍵性決策，以及該國對於外部世界的政策。⁴¹正所謂「外交乃內政的延長」，這亦是本文企圖透過前面表 1 與表 2 來傳達的主要看法。

在這方面，部份中國學者也開始發展出「由內政到外交」以及「由思維到作為」的大戰略設定方法。例如周建明與王海良便指出，「國家的大戰略應該是在國基安全戰略之上，包括發展與安全兩個戰略，並綜合考慮內外形勢、可動用資源、國家的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的大戰略框架」，其中，「國家發展戰略是由公共利益也就是社會整體利益所決定的，涵蓋國內發展的各個層面，包括經濟發展戰略、科技發展戰略、社會發展戰略、文化發展戰略」，此外也將經濟與政治層面的改革運動包涵進來。⁴²至於胡鞍鋼則以經濟學者的角色，在其主編的《中國大戰略》一書中引進「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長期戰略觀點，並將保持政治與社會穩定、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實現社會公平、滿足基本需求與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以及保護和建設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等設定為五大發展目標，然後以此所累積的綜合國力，奠定中國外交與安全戰略的基礎。⁴³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capability）的相關研究不僅自 1990 年代起與中國的大戰略研究同時並進，甚至所掀起的熱

⁴⁰ 可參考俞正梁等《大國戰略研究》和葉自成《中國大戰略》（第 1-5 章）等書的看法。

⁴¹ Richard Rosecrance 與 Arthur Stein 編，劉東國譯，《大戰略的國內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5。

⁴² 周建明與王海良，〈國家大戰略、國家安全戰略與國家利益〉，《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 年第 4 期，頁 21-26。

⁴³ 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略》，頁 4-5。

潮還猶有過之。⁴⁴儘管學界對何謂綜合國力可說眾說紛紜，無法找到確切且能為多數接受的定義，再加上時代環境的演進也不斷改變國力組成的內涵，⁴⁵但由於戰略的理性設計與執行終究必須奠基於國家所實際擁有的能力，因此如何正確地進行自我評估便成為大戰略思維中非常關鍵的出發點。

相較於多數學者將「中國崛起」與「中國成為大國的必然性」作為思考或分析中國大戰略的基礎，門洪華在2005年所出版的《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一書，可說是當前國內對於大戰略思考相對較為成熟的一份研究成果。該書將關於中國大戰略的研究架構建立在國家實力、國際制度與戰略觀念等三個核心變量的基礎上，⁴⁶並在概略敘述研究框架後，隨即從國家實力的評估入手，設法找出中國得以用來實踐戰略設定的能力值多寡。無獨有偶的是，美國賓州大學教授 Avery Goldstein 也在2005年出版一本研究中國大戰略問題的著作，同樣從探討中國所擁有的能力切入，⁴⁷但差別在於，相較於中國學者企圖找出足以確切計算國家實力的公式（有時與其說他們的目標在找出一套公式，還不如說只是透過若干樂觀數字來印證其先入為主的期待），Goldstein 則主要還是以分析現象與問題為主；因為，後者認為除非藉由實地測試（例如爆發危機、軍事衝突或戰爭），否則非但國家實力的估計值與實際值間經常存在相當大的潛在落差，由此所導致的誤判也往往埋下更多問題的伏筆。⁴⁸從這個角度來看，由於中國自從1979年懲越戰爭後便不再介入國際衝突（即便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也無法提供足夠訊息），因此，目

⁴⁴ 根據「中國期刊網」的檢索結果，光在1994-2005年間便有超過350篇以上從事理論與中國本身評估的研究論文，例如袁國敏與朱力，〈綜合國力測定方法研究〉，《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6期，頁40-42；趙雲波，〈綜合國力構成要素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5期，頁75-80；胡鞍鋼與門洪華，〈中美印日俄有形戰略資源比較〉，《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2期，頁26-41；李長久，〈綜合國力的比較與發展趨勢〉，《太平洋學報》，2003年第1期，頁63-70。

⁴⁵ See 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and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Santa Monica: RAND, 2000).

⁴⁶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頁57-59。

⁴⁷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⁴⁸ See also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39:3(1987), pp.353-381.

前中國到底擁有多少實力便不免呈現各說各話的局面。

在此，個人認為，正確的戰略思維固然必須從正確的自我認知出發，亦即若越能掌握自身的國家能量，便越能設定出理性的政策方向，但事實是由人類社會所組成的國際體系的確存在著比自然世界更複雜的變化可能性，因此在設法瞭解國家實力的過程中，與其不切實際地企圖「計算」出某種象徵性數字，還不如努力透過「制度」的建構與自我修正來確保決策理性度；由此，或許真正的大戰略才有浮現的可能性。

肆、理論反思與中國大戰略的未來

相對於討論「到底什麼是中國的大戰略」這個實際的問題，本文的重點其實是擺在「到底什麼是大戰略」以及「中國應當如何思考其大戰略」這兩個框架性問題上頭。針對第一個問題，正如前述，個人認為由於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能量導致國際體系結構進行持續且快速的變遷，作為維繫國家生存的思考性工具，戰略內涵自然也須與時俱進，至於其結果則是超越傳統軍事狹義性，進而將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發展都概括進來的一套「大戰略」架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相較於傳統戰略主要處理「現在式」的問題（亦即當前國家所面臨的內外現實挑戰），大戰略則更多思考的是「未來式」的發展（包括國家對自我未來的預判或期許），例如伊藤憲一便認為所謂「……大戰略不外乎是國家的最高政治戰略，它決定著國家的百年大計。」⁴⁹其次，隨著全球化浪潮對國家間關係所產生的拉近效應，為解決由此所衍生的一連串互動，相對於只有大國才必須去思考大戰略問題的傳統，今日則所有國家均不可避免地得將大戰略視為某種新的生活必需品；儘管其迫切性仍舊將因國家所擁有之權力大小不同而有所差異，亦即中等國家比小國更需要建構大戰略，而崛起中大國（例如中國）的急迫性當然也更高。

如同 Paul Kennedy 所言：「在世界事務當中，領先國家間的相對力量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主要原因是，不同社會間不同的發展速度以及技術與組織

⁴⁹ 伊藤憲一，《國家與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9。

機構的突破，將為某些特定國家帶來更大好處的結果。」⁵⁰當前全球對所謂「中國崛起」的討論非但或許反映出若干國家間相對力量變遷的態勢，事實上，中國也對此做出了正面回應，例如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中便明確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⁵¹當然，抓住此戰略機遇期的直接辦法便是建構出一套足以因應世局變化的大戰略框架。

不過，正如我們在前一個段落中所提及的，目前國內對於相關討論所犯的最大問題是將「大戰略」與「大國戰略」混淆在一起。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本身缺乏自己的戰略理論，因此對大戰略的研究多半從歸納西方說法入手，而前述混淆則是西方學界常犯的毛病；更重要的是，西方在建構大國戰略理論的背後其實還有著一套對於大國行為的既定看法，例如 Martin Wight 便認為：「……大國進行擴張是種天性；……其力量經常透過文化、經濟和政治進行輻射，除非存在巨大障礙，這些傾向都將導致領土擴張。」⁵²正因如此，在看待「中國崛起」問題時伴隨著對於「中國威脅」的憂慮也算是相當自然的現象。⁵³無論如此，我們的討論重點並非中國威脅問題，而是中國是否因為以西方論述作為建構其未來大戰略的基礎，從而既引入西方式的大國行為邏輯，跟著也將陷入與西方式大國興衰同樣的循環陷阱；更甚者，過度強調大國信念不僅將帶來不理性的自我期待與擴張行為，其結果也未必是好的，在上個世紀中由於採取全盤西化政策導致國勢旋起旋落的日本，以及過分重視追趕與擴張的德國正足為殷鑑。因此，如何從自身傳統文化中找到不同於西方的戰略支撐觀念，然後

⁵⁰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xv-xvi.

⁵¹ 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8。

⁵² Martin Wright (eds. by 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 *Power Politics* (Leister: Lei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44.

⁵³ 相對著新興大國的崛起，國際上的既有支配者往往會在(1)預防性戰爭、(2)遏制政策、(3)追隨、(4)約束、(5)接觸、與(6)迴避間選擇一種態度；Randal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1-31. 本書基本上建議美國應對中國崛起態勢選擇「接觸」政策。

以更客觀中立的立場去重新思索人類歷史與當前國際關係發展，或許是未來中國進一步鞏固大戰略框架過程中所亟需補充的思維。